

附錄三 外文報紙引文之中譯

註 1 *The Nation* 在介紹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時，有以下一段文字：「這本書在語調和精神上，是一個有學問的中國人爲他的國家與領導人所做的激昂辯護。這個中國人曾經研讀過歐洲文明，不過他比較喜愛自己國家的文明。他相信真實的慈禧與上海新聞界以激昂想像力炮製出的她，是截然相反而不同的。在他的眼裡，她是真正的『國母』，有智慧，仁慈與能幹；民眾真誠地尊敬她。」從這段文字的介紹，便可知曉辜氏對慈禧的擁護與愛戴之情了。見 *The Nation*, Sept. 25, 1902, p. 253.

註 2 巴爾的摩 *Sun* (《太陽報》) “The Scholar in Politics in China”一文大意如下：「中國的政治學者如果反對行政當局的話，他將無法過著快樂的生活。如果他是一位相信政府做的任何事總是而且一定是正確(whatever the Government does is always and necessarily right) 的社會賢達，他便可以活到長命百歲(live to a green old age)。如果他對行政當局的政策採取悲觀的看法，卻能逃過官府劊子手的魔掌，將是萬分僥倖。中國政府無法容忍任何胡言亂語，它對認爲國家會一蹶不振的中國人是沒有耐心的。然而，有時候它會不正當地利用政治學者，它會邀請社會賢達提交論文來爲行政上的改革作建言。但是如果這些學者誠懇地接受邀請，而且提出擁護對現存秩序加以改變的建議，將立刻招惹政府的不悅，而且被強迫離開國家以免慘遭劊子手的魔掌……實施這一種制度的國家有會什麼希望呢？——在一個國家裡，沒有人敢有和統治者不一樣的意見。無怪乎俄國發現占領中國的完整省分與犯下讓有自尊心的人民不能容忍的其他侵略，是相對容易的……在中國，每一個不支持政府的人都被封口，其結果是西方人民了解的這個字(詞)——『愛國主義』(patriotism)，在天朝裡卻不見蹤影，那些愛國的人一定要到別的國家才能盡情享受擁有他們自己信念的樂趣。這就是擁有龐大人口的大國卻無力驅逐俄國侵略的絕大理由。面對顯然是作爲北方政權工具的專制、腐敗政府，中國人民是無助的。這個可憐處境，就是一個曾經強大的帝國經由內部腐化、鎮壓自由言論、盲從古老習俗和慣例與視愛國主義爲罪行而形成的。於是中國已經變成了各國輕蔑的對象與笑料。」 *North China Herald*, Sept. 11, 1903, pp. 557-558.

註 3 Alicia Little, “Mr. Ku Hung-ming and the Tien Tsu Hui,” *North China Herald*.

Mar. 16, 1906, p.602. 譯文為「在這位紳士最近的著作裡——確實是今年的——如此記載：『中國女人必須把她們的雙腳弄殘，來自我保護以免過度工作。』某些中國紳士不會在您的專欄裡，或者另行公開地為他們族類的男人清除這個投射在他們身上的惡名嗎？如果他們的女人能工作，這個族類的男人將讓她們過度工作，那麼把自己弄殘對她們而言是較為有益的。這是我曾經聽到過的中國人因為贊成纏足所極力主張的唯一藉口。既然這個藉口乃由被指派為黃浦濬滌局重要職位的中國官員所提出，為了把女人與女孩從中國女士稱作中國咀咒裡解放出來而經常把自己搞得疲累不堪的外國女士們，將樂意聽到中國男士們的保證，就是這個族類的男人駁斥這個企圖投射在他們身上的可怕毀謗。至於辜鴻銘先生所說有關天足會女士們的談話，不妨就別提了。我們大多數人承認忙碌有罪，如果有人認為我們體格健壯，我想我們應讓把這句話當作恭維。他使用這些字眼時，明擺著沒有恭維的意思，但那只是品味的問題而已。」

註 4 Tong Kai-son, *North China Herald*, Mar. 16, 1906, p.602. 譯文為「無論如何，我首先想說的是，辜鴻銘是我的朋友，而且長久以來，我一直是他卓越文學能力的仰慕者。我也仰慕他的強烈愛國主義，而且相信沒有人會比他更能敏銳地感受到中國已經且正在遭受的在外國政府與外國人控制之下的不公平行為。因為這個理由，當辜先生寫有關外國人與外國的事時，一股尖刻的諷刺總是從他的筆端流瀉而出。但正是他情感裡的強度通常扭曲了他的判斷，以致他的觀點失去了平衡。這個平衡對說服他的讀者是不可或缺的。討論到纏足這個題目，像我就一定不同意他的意見，而且我知道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也不同意他的意見……我應該向天足會的外國女士們所保證的陳述是，中國的進步人士不支持纏足，她們一心一意推行的改革運動，正在中國的每個地方產生效力……但是我不認為辜鴻銘先生在他寫那些被 Mrs. Little 提及的陳述時，態度是認真的。至少，我希望如此。」

註 5 W. Arthur Cornary, “Pu Kan Tang (“I Dare Not Presume.”),” *North China*

Herald, Mar. 16, 1906, p.603. 譯文為「先生——你的通訊專欄無疑充斥著最近相當有趣的『副本』，從能幹的作者辜鴻銘先生發出的某些言論，似乎已經將有關女人天足的話題抬高到一個接近『協商委員會』本身的有趣位置。」

懷著對辜先生與天足會的敬意，我將大膽提議，真的不要把他當一回事，他已經用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為天足會做了廣告了。」

- 註 6 黃浦濬潔局在 1907 年 10 月 31 日發布的消息裡幕僚異動部分，云：「本土幕僚辜鴻銘先生，因為前往北京就任特殊的工作而請假，將在十月分返回工作崗位。」原文如下：“Native staff. Mr. Ku Hung-ming, absent on leave for special work at Peking, returned to duty in December.” *North China Herald*, Feb.28, 1908, p. 518. 辜氏當時在上海工作出缺，就是前往北京就任外務部員外郎。
- 註 7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7, 1917, p. 14. 譯文為「就首都而言，張勳的政變結果是一個徹底的成功，街上的人們似乎歡迎這個改變。一分詔書陳述了政府改變的一個特徵就是陰曆的恢復使用……一批昨夜頒布的聖旨做出了許多有趣的聲明。辜鴻銘，一個在 Hintse 的前德國部長的私人朋友，而且從戰爭發生以來即惡名昭彰地支持德國，他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
- 註 8 S. K. Hu, “China’s Literature ‘Too literary for 90% of Population’,”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July 16, 1919, p. 282. 譯文為「我不建議去捍衛胡適博士，但我認為在引用莎士比亞時，辜先生寧願打敗他的對象而不願給他任何好處。當然，比起莎士比亞，通俗英語在世界上被教得更多。我認為辜先生將反對任何科學家會以高貴的莎士比亞文體來寫物理或化學，而且基於同樣的理由，我認為文學革命已經啓動了。文言漢語有它的美，不過無疑地，它在日常生活裡的效用卻可能會被質疑。中國應該是一個文學國家，但是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是文盲，正因為美麗的文言漢文是如此地遠離人生，如此地矯揉造作，如此地困難學習。」
- 註 9 Shu Shih-Chun, “Support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Reform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July 16, 1919, pp. 379-380. 譯文為「那些感到有需要改革文言漢語的人，在回應現代民主的傾向，或許將同情胡適博士及其同伴對徹底改革古典漢文做出的努力，而且或許將認為辜鴻銘先生在譴責這整個運動時有點過於嚴苛。辜先生在他七月十二日登載於《密勒氏評論》的文章裡，似乎藉由堅持表示文言漢語是活的語言而非死的語言這一點，在為文言漢文原貌的保存提出辯護的理由。他主張死的語言是「笨拙的、呆滯的、無生命的」，或者「不是一種通行的語言」，像希臘語與拉丁語便是。但對一個講究實際的有才智

者而言，任何無法言說的語言都是一種死語言，而且任何死語言，在那樣的意義下，是無法製造一種廣為流傳的文學的，一種屬於整個民族的文學。基於那個觀點，文言漢語乃亟需改革——它需要這樣的改革讓自己能適應於出現於目前環境裡正在增加與擴大的要求。先不管有關古典漢文（classical Chinese）是死是活的所有意見之間的差異與所有其他的考慮，文學改革從功利與實用裡獲得了合理化的藉口，如果不從美學或情感的觀點來看的話。一種由少數文人專門培育而成卻遠非絕大多數的普通人民所能企及的文學，在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下，絕非一種民族的或普遍的語言。公正的批評家，包括中國人與外國人，都將一致同意這個意見，即純粹的文言漢文（literary Chinese）對於普通心智的人們來說，太過抽象與困難以致難以理解，它需要花好幾年或甚至數十年去掌握它。在我們的觀念之中，這樣的語言對創造一種普遍的文學而言是完全不適合的。任何不能製造足以綜合與表達民族的理想、抱負與希望，的文學的語言，皆不足以稱為實用，因此無法被稱為是活的文學，雖然它可能擁有自身的價值。所以問題出現在這裡，文言漢語能製造一種能高度表達整體人民的理想與思想嗎？這個答案無疑是否定的。因此如果真正的民主與公共意見將盛行於這個國家的話，文言漢文不用說必須立刻讓自己適應於當前中國的需要。再一次的，我要對辜先生說，任何一種語言能夠廣受歡迎與被言說，甚至還被認為是『高貴的』與美麗的，全然在於某種思想如何使用一種純粹與簡單的語言來自我表達。（“……a language can be popular and spoken, and yet ‘noble’ and beautiful. All depends upon how a thought expresses itself in a pure and simple language.”）」

註 10 Mens Sanain Corpore Sano, “More o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Aug. 2, 1919, p. 363. 譯文為「你們〈反對文學改革〉的文章讓我想到了 Vienne 打擊雨果 (Victor Hugo, 1802–1855) 的詩文……中國文學革命正在進行的工作並不比雨果及其同伙偉大，這種現象向我們充分解釋了某些人充滿敵意與絕望的態度。然而 Vienne 與亞力山卓·杜瓦 (Jay Alexandre Duval, 1767–1842) 還是被准許有言論自由的，因為他們只是『老瘋子』(vieux maniaques)，而不是皮耶·羅迪 (Pierre Loti, 1850–1923) 的『狂熱土狼』(Hyene Enragee)。」

註 11 Hallet Abend, “Discord with China Laid to Our ‘Pests’,” *New York Times*, 27 June 1927, p. 7. 譯文為：「舊式的傳教士將自己埋首於傳播基督教與慈善工作，他們是令人滿意的。」他宣稱道：「但是大部分新式的傳教士花時間去教授『新學』而且干涉與他們不相干的政事。他們一點也不令人滿意（They are far from splendid.）。不過，新式傳教士竟然會藉由活躍道德的偽善性（by keeping the hypocrisy of morality alive），阻止了流浪漢（the beach-combing）與死硬派條約類型的外國人（die-hard treaty type of foreigners）去做極過分的事。他們對於他的國人同胞而言，就像一個持續的煞車。」

註 12 Ibid. 譯文為「舉個例子，當我還是一個年輕人時，甚至是我家的女人也在紡紗與織布。在那個時候，有相當三億個中國女人在紡紗與織布。接著便宜的外國棉製物品進口了，這三億個女人現在失去了她們的生產生活，而且一定要依賴他們男性家屬的勞動來過活。」

註 13 *North China Herald*, May 5, 1928, p. 182. 原文為：“Dr. Ku leaves a wife, a son, and two daughters unprovided for, but his friends assume that a cousin in Formosa; who is a very rich sugar magnate, will come forward to help them, whilst Marsha Chang Tso-lin, who latterly has been in sympathy with the old style philosophy and mad Dr. Ku Hung-ming his adviser, undoubtedly will see that the farewell honours are adequate.” 譯文為「辜博士留下了一個妻子、一個兒子與兩個女兒，生活陷入窘境，然而他的朋友們認為，他一位住在台灣的堂弟，乃一極為富有的糖業鉅子，將前來幫助他們。同時，張作霖元帥，他最近認同舊式哲學，讓辜鴻銘博士成為他的顧問，無疑將使告別式備極哀榮。」

